

青年视点·沈杏培主持

“绿林鲁迅”与黄埔李秉中交往考论

薛晨鸣

摘要：1924年，李秉中受鲁迅资助南下广州、投身黄埔军校，随后以书信遥寄北京，成为鲁迅观察国民革命的黄埔之眼。李秉中投笔从戎的行伍体验，一方面，牵引出被遮蔽的“绿林鲁迅”形象，剥离出以革命杀戮体验、革命为何而战为核心的“李秉中之问”；另一方面，使鲁迅从退后一步的生命主义壕堑论，到前进一步的直面战斗生死观，完成了“绿林鲁迅”的自我迭代。李秉中所指涉的文学者与革命军的自我身份转型、文学域与革命域的越轨对流，为鲁迅理解“同路人”方案提供了前瞻样本和肉身投影。

关键词：“绿林鲁迅”；李秉中；黄埔；壕堑战；同路人

20世纪前30年，孙中山接连发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以建立民国和再造民国的革命迭代态势，强劲推动着晚清中国之后的政治架构调整。此番景象波及鲁迅处，接连形成盛赞辛亥革命、“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①的革命效能有限体验、总结缺少“党军”的辛亥革命经验、观察国民革命走向何如的鲁迅心理图谱。

需要指出的是，当鲁迅敏锐诊断出孙中山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②时，20世纪20年代的孙中山也同样认识到这一问题，拟设了“以党建军”三步走策略，即“党的改组”“以党办校（军校）”“由校建军”，其中黄埔军校的创建是核心环节。^③然而，鲁迅与孙中山的这种革命战略上的契合，并未在现有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鲁迅与孙中山以其显著性的身份标签被分置于文学

者、革命者的阵营之列，二者之间很难有直接流通渠道；另一方面，鲁迅发现辛亥革命短板之际，正处于后五四低潮时期、辛亥/国民革命青黄不接之时，且鲁迅本人仍身处北京而未南下。因此，鲁迅与孙中山及再度兴起的国民革命之间的理念关联便被悬置了。

细究可发现，国民革命伊始，鲁迅对其抱有热切期待，而这份期待更有肉身化的具体衔接对象——李秉中。李秉中南下黄埔参军，以书信

① 鲁迅：《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页。

③ 曾庆榴：《黄埔军校史（1924—1927）》，第40—4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遥寄北京,成为鲁迅在北京时的黄埔望远镜。学界对于鲁迅与李秉中的考察多限于北京时期二者的交往史实,以及新发现史料的考证,^①尚未在革命时代和思想结构中阐述二者之间的观念互动意义,而这正是本文努力之所在。

一、“到黄埔去”的南下热潮 与鲁迅资助李秉中始末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直接推动了黄埔军校的创立。在历次革命和陈炯明叛乱问题上,孙中山长期思考如何筹建并管理军队。在国民党一大时期,孙中山对此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以失败总括辛亥革命所缔造出的民国:“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象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②究其失败缘由,孙中山认为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③。故而,孙中山提出师法苏俄,“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④。而要成立革命军,就需要“拿先烈做模范”,并“学革命党的奋斗”,^⑤以此打造不怕死的军队,维持共和,推翻军阀。由此,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宣告诞生。^⑥

黄埔军校成立后,“到黄埔去”成为这一时期青年群体中的热潮。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办学,共三期。其中李秉中即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入学。李秉中南下黄埔的入学史与鲁迅紧密相连。

李秉中(1902—1940),字庸倩,四川人。其人于1922年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1924年1月29日,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李秉中的名字:“上午李秉中来,字庸倩。”^⑦袁洪权新发现一则史料,即李秉中所写的《鲁迅先生遗书一束》,刊于南京版《新民报》副刊“新园地”第293期。该文提供了鲁迅与李秉中相识交往的更多细节。文中记载二人相识始末:“我是从民国十一年在北京大学听他讲课,因为偶然以一篇作品请他看看,蒙

他约我到他当时的住宅(砖塔胡同)去谈话。”^⑧及至鲁迅迁居西三条胡同后,李秉中与鲁迅交往愈发频繁,“每礼拜多则两次,少则一次到先生家去,去时总是午后,顺便吃晚饭。先生的绍兴菜很好吃,酒味很美。饭后抽烟喝茶,一直总谈到九十点钟才走”^⑨。

1923年7月18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居至砖塔胡同。1923年,鲁迅创作罕见低迷,可见其情感受挫严重,内心苦闷不堪。1924年,李秉中的出现重新激活了鲁迅与青年的交往,并成为鲁迅的首要通信对象。鲁迅曾在信中如数告知李秉中自己的时间安排,随后,鲁迅日记中“李庸倩来”的记载逐渐增多。二人相识八个多月时,鲁迅曾在信中剖白心迹:“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⑩此时,鲁迅在自我存在

① 既有研究参见夏晓静:《边雪鸿泥:从〈鲁迅遗书〉谈起——兼及“小朋友梵儿”赠书及一页手稿》,《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袁洪权:《李秉中其人——从新发现的〈鲁迅先生遗书一束〉谈起》,《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2期;朱正:《李秉中的一则材料》,《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3期;黎保荣:《〈李秉中其人〉的史料错讹与指疑——兼谈新发现的李秉中材料》,《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3年第4期。

②③④⑤ 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90、291、292、2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⑥ 据《黄埔军校史(1924—1927)》记载,1924年3月,黄埔军校开始招生;5月初新生入学,实行预备教育;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初名“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东征时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见曾庆榴:《黄埔军校史(1924—1927)》,第78页。本文为行文方便,皆以黄埔军校指称。

⑦ 鲁迅:《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499页。

⑧⑨ 李秉中:《鲁迅先生遗书一束》,《新民报》(南京)副刊“新园地”第293期,1936年10月26日。

⑩ 鲁迅:《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52页。

与外界期许的摩擦中备受煎熬,产生内在自毁式的痛苦,他将此称为“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①,不愿传染给别人。鲁迅在真诚坦白内心苦楚后,仍表示出对李秉中前来交流的欢迎:“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②可见,鲁迅与李秉中的师生情谊已经到了可以互诉衷肠的程度。

李秉中初到北京时,生活颇为拮据。其间,鲁迅为李秉中的经济问题频繁奔波。整合现有史料,可以发现鲁迅为其所做的三件事。其一,鲁迅为其介绍报刊编辑工作,以此补益生活。李秉中回忆道:“因为我的生活很困难,常得先生和刘叔正先生的帮助和鼓励。那时孙伏园在编辑晨报副刊,孙席珍在那里校对,暑期孙席珍请假回乡,由先生介绍我去代理,后来孙希珍同我成好朋友了。”^③

其二,为帮助李秉中出售《边雪鸿泥记》,鲁迅动用周遭关系,多次致信胡适,尝试出售书稿,但最终并未成功。^④鲁迅曾在书信中告知李秉中自己所进行的多番尝试:“《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无暇;近又托孙伏园面问,未遇,乃写信问,仍无复,则不知其何故也。或者已上秘魔崖修道,抑仍在北京著书,皆不可知。来信令我作书再催并介绍,今写则写矣,附上,但即令见面,恐其不得要领,仍与未见无异,‘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谓也。况我又不善简牍,不能作宛转动听之言哉。”^⑤鲁迅尽力之心,溢于言表。鲁迅在借钱购房、仍有负债的情况下,将手头所有的二十元借给李秉中,并允诺,如若端午发放工资,可再借其三十元。实则,鲁迅赠送李秉中共计五十元。在1924年5月30日的日记中,鲁迅记述道:“假李庸倩以泉五十。”^⑥

其三,在李秉中的家乡、四川省刊物《文史杂志》上曾刊登廖彬的文章《鲁迅与青年学生李秉中》,其中提到鲁迅对李秉中投身黄埔的帮助:“鲁迅曾给当时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并跨党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写了一封介绍信,并赠

送了路费给李秉中。”^⑦笔者暂未在《鲁迅全集》或相关资料中找到鲁迅联系谭平山的具体依据,但根据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这一说法也极具可能性。据《黄埔军校史(1924—1927)》记载,黄埔军校筹创时,全国各地多处于军阀势力之下,招生不易,只得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在各地引荐、介绍考生。^⑧由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所办,其章程明确规定投考者“须有国民党员介绍”^⑨,加上国共合作的历史因素,此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积极为黄埔军校选拔学生,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胡公冕、李维汉等。^⑩因此,鲁迅通过谭平山举荐李秉中具有历史合理性。

综合上述,鲁迅在1924年与李秉中相识,二人师生情谊甚笃,其后李秉中南下广州、投身黄埔,鲁迅提供了经济和人脉的多重支持,二人自此全靠书信往来。然而,据李秉中回忆:“先生给我的信,遗失得很多,第一次是十三年在广东棉湖作战,从石桥上掉下河里,把身上背的东西通通丢了,才爬起来。先生的十几封信和几册书都在背囊里一并丢失。第二次是十六年从俄国回来,恐怕在上海被嫌疑,所携书籍等件,通通抛在海里,不留片纸只字。”^⑪所幸,1925年李秉中身处黄埔军校时期,寄给鲁迅的通信仍有7封保存下来,以此得以拼凑出李秉中给鲁迅传递的黄埔体验。

二、“绿林鲁迅”与“李秉中之问”

据《黄埔军校史(1924—1927)》记载,黄埔

①②⑤ 鲁迅:《240924 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53、453、448页。

③⑪ 李秉中:《鲁迅先生遗书一束》,《新民报》(南京)副刊“新园地”第293期,1936年10月26日。

④ “《边雪鸿泥记》事件”始末,可参见夏晓静:《边雪鸿泥:从〈鲁迅遗书〉谈起——兼及“小朋友梵儿”赠书及一页手稿》,《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6期。

⑥ 鲁迅:《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514页。

⑦ 廖彬:《鲁迅与青年学生李秉中》,《文史杂志》1991年第3期。

⑧⑨⑩ 曾庆榴:《黄埔军校史(1924—1927)》,第45、87、88页。

第三期学生于1924年冬入学,1925年元旦成立入伍生总队,编为三个营。入伍生训练期为三个月,期满后方能升学。黄埔第三期于1925年7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修学期为六个月,于次年1月17日毕业,本期共计毕业1233人。第三期学生的特殊战斗经验在于,第一次东征期间,入伍生担任广州、虎门之间的护送运输任务;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时,入伍生在广州从猎德村渡河,协助作战。^①

李秉中作为黄埔第三期入伍生,经历了校内训练和东征实战。他对革命战斗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初入伍时的自由豪迈,到讨伐陈炯明时的热血愤张,最后对人与人相互杀害感到厌恶疲惫。这一系列感受的转折在现存的李秉中致鲁迅的7封信(1925年1月16日—1925年5月7日)中得以呈现。

第一阶段,李秉中投笔从戎后倍感新奇,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勇猛想象交织在一起。1925年1月16日,李秉中寄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将北大学生到黄埔入伍生的身份转型称为“思想变迁”,并表示对黄埔训练生活的适应:“此种生活,所以于我甚适者,盖由终日劳劳,故能食则饱睡则适,更无多暇以胡思乱想也。”^②然而,这种体验并未维持多久,1月23日,李秉中去信中即表示“请先生恕我以前说的话,已经不是今天的我说的了那种意思”^③。训练生活所带来的肉体强化,逐步覆盖了李秉中此前在北京时的学生思考。然而,纯粹的求学思考或许因为并无实效而让其彷徨苦闷,但军中毫无人生求索的生活也逐渐让李秉中难以忍受。

此时,李秉中内心产生个人英雄主义愤张与彷徨痛苦相叠加的体验,这与鲁迅留日时期的战斗思想和斯巴达精神、兄弟失和后饱含“鬼气”“毒气”侵扰的心境彼此映照。或者说,在与鲁迅交往的过程中,李秉中逐步获得了鲁迅的部分人生体验和思考方式,这也成为其投军苦闷时期的精神支柱和情绪宣泄方式。于是,李秉中的军校训练反馈与鲁迅多时段的生命体验,出现了叠加共生之态。

李秉中曾在训练中获得“战斗者个人”的个体自觉意识,他在书信中表露道:“我在这压迫呆滞琐碎卑微的生活中,仍是感觉痛苦,很想

独自一人荷戈与剑,横行于四无生灵的大宇中,予知自雄自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也。”^④这种在周遭混沌中赋予自我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战斗意志的态势,既与鲁迅1924年创作《彷徨》小说集时“两间余一卒,荷载独彷徨”^⑤的体验交叠,又有一种年轻豪迈的军武杀伐之气。鲁迅曾于1903年翻译《斯巴达之魂》,其中有言:“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⑥鲁迅以斯巴达将士殊死战斗、全军歼灭也要守护国民的事迹,鼓舞青年奋起反抗。多年之后,李秉中正是处于南方战斗的集训地中,俨然成为鲁迅所召唤的“斯巴达战士”。

于是,李秉中书信构建出一个承自斯巴达尚武精神、异于兄弟失和苦闷、不限于文学者身份的“绿林鲁迅”形象。李秉中身在黄埔时,不仅牵挂着鲁迅“啸聚绿林”的豪迈之气,也将黄埔的军事站位遥递鲁迅:“先生常说欲啸聚绿林而难于得适宜之地,我看黄埔要算是最好的了,因为处在珠江中流,岛上山势起伏,汉港萦回,凡有炮垒十数座,更兼土地膏腴,物产足以自给,且为海舶江轮来往必经之处,当无虞财路不佳、有林冲雪夜上梁山为王伦索取‘信物’之苦也。当陈炯明叛变时,中山先生退守岛上,陈家军攻之弥月,卒不能下。”^⑦黄埔地理位置优越、孙陈攻防信息传递之余,李秉中仍有一种革命战斗的乐观态度:“先生如有意南来聚义[,]生愿执干戈以隶麾下,纠结一班弟兄,共尊先生坐头把交椅也。”^⑧

不仅如此,李秉中抵抗枯燥军旅生活的方式与鲁迅所期许的摩罗诗人不谋而合。具体来说,李秉中认为:“军中生活之令人留恋者,唯野外演习[,]与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山川草木,素面相对,毫无隔阂,觉着物皆与我息息相通,

① 曾庆榴:《黄埔军校史(1924—1927)》,第79—80页。

②③④⑦⑧ 李秉中:《李秉中致鲁迅信》,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48、49、49、50、5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⑤ 鲁迅:《题〈彷徨〉》,《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56页。

⑥ 鲁迅:《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第七卷,第9页。

而能见其色笑,闻其音响,穷其变态。”^①鲁迅在日本作文时,苦求精神之战士,能带中国出荒漠之境。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提到摩罗诗人在现实中备受排挤之艰难,于是提出解决方案:“虽然,其独慰诗人之心者,则尚有天然在焉。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天物之不伪,遂寄之无限之温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是。”^②可见,李秉中此时的人生感悟是以鲁迅经验为参照组织而成,鲁迅早期推崇的兼具精神界之战士和尚武精神的双重期许,均在李秉中身上得到印证。于是,李秉中此时内心承载着鲁迅早期至1924年的革命思考,投入国民革命所掀起的新一轮革命浪潮中。

与之呼应的是,鲁迅在1925年底写作《〈华盖集〉题记》时,落款为“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③。《鲁迅全集》将“绿林书屋”解释为鲁迅对“土匪”“学匪”称呼的回应。^④李秉中的书信扩充了“绿林鲁迅”的辐射内涵,既指称鲁迅对教育部官员进行回击时的文坛匪气,又辐射出文学家鲁迅内心汹涌的尚武精神和革命意志。

第二阶段,在讨伐陈炯明的黄埔实战中,李秉中亲历淡水之役和棉湖之役,对于革命战斗的态度由热情好奇到生死未卜的无力。

1925年春,国民政府大本营发起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役。黄埔军校也为此举办动员仪式,李秉中记载在元旦时,全体入伍生三呼“杀陈炯明”,并已有一营前往虎门。战斗动员时期,李秉中对上阵杀敌充满了搏斗期待,一方面,他将上战场视为“南来欲于不平安中求一有趣味的丧失生命之法”^⑤,在人与人的搏斗中,无论是杀敌或为敌人所杀,均可视为快事。另一方面,李秉中将上阵杀敌定位为“好奇”且“恨人类”,这一判断似乎有鲁迅1924年致信中“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⑥的投影,李秉中如此表述:“我的出发到战场,与其说我是革命,不如说我是好奇。我也如先生,并不爱人类,而且我颇恨人类,而且并不爱我,所以与其说我是革命,是为革命而战,为革命去杀反革命的民贼,不如说我是伙着恨得较轻的人去杀恨得重的人,而且在战场上去赏玩人类的相杀。”^⑦李秉中此时的战斗狂热主要源于自身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人际交往中的复仇意识。这一复仇可能源于致李

秉中贫困的根源,即他原本家庭优渥,但父母去世后,家产被舅父霸占。^⑧革命这种动员方式和宏大概念并未渗透到李秉中的战前意识里。

然而,这种非理性人类相杀的狂欢并未持续多久,李秉中即产生了三个维度的自我反思。其一,当他慷慨陈词,在战场上赏玩人类相杀时,考虑到了自己的小妹玉琳。如果自己的生命不能保存,李秉中以托孤的口吻询问鲁迅,能否将小妹托付给国民党好友。这种快意恩仇下愿意献祭自己,但又牵挂家人的瞻前顾后之态,几乎与鲁迅当年面对是否加入光复会的难题而产生的矛盾心理一样,只是鲁迅考虑到照顾家人而退却,其后数年都以“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⑨的赎罪心理在思想革命上继续战斗。而李秉中此时遇到同样的困境,鲁迅可谓是最能体会其痛苦之人。

其二,李秉中在嗜血的非理性宣言后,因考虑小妹托孤问题,其狂热思维逐步冷却下来,并转向人道主义的温情时刻,因此,在同一封信中也出现了与非理性杀戮时刻相对立的冷静思考。其书信中谈道:“将来人类进化,总要免除‘不得已’的时候,而终于‘不用之’[,]或人类竟常常‘不得已’,但发明以他种无机物代人为兵相杀而不残,岂不好吗?”^⑩杀戮与保存生命意识的观念交锋,在黄埔备战前夕达到了巅峰,此时李秉中也饱受两股相悖力量的撕扯。

其三,李秉中在行军途中突有所悟,即“战争为至大之赌博”^⑪。在行军跋涉之际,参军者不仅要调动起内心非理性的狂热情绪来振奋精神,以至于李秉中“自己疑心我是一个超人”^⑫;同时要以完全未知的状态等待前方战线传来的攻防消息,以此调整军队布局。这种体验方式类

①⑤⑦⑩⑪⑫ 李秉中:《李秉中致鲁迅信》,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49、51、52、53、54、54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88页。

③④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7页。

⑥⑨ 鲁迅:《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53页。

⑧ 《俞芳谈鲁迅与阮和森、宋子佩、李秉中》,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99-200页,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1978。

似赌博,在前线攻克东莞县城胜利之时,李秉中会对战场情形如何倍感好奇:“战场风味窃揣必趣味浓郁,以人性好奇而特嗜不可知,而可令人兴奋之事。赌博之所以引人留连,盖以此故。战争为至大之赌博,苟身历其境,必令精神之兴奋至极,皇然忘却我,忘却人,忘大宇一切,而入于无何有之世界。”^①

然而,淡水、棉湖之役的实战经历,让李秉中真正体会到革命旗帜下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兵凶战危、命悬一线的战场凶险。1925年2月1日,黄埔军校开始东征。14日,黄埔军校教导团与粤军各部先后进至淡水城下。晚上,黄埔军校颁布命令:“本校长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兵卒久暴荒野,爰特挑选奋勇军,誓于最短期攻破淡水,仰尔将士务体此心,抱定为党为国牺牲之决心,奋勇迈进,可进不可退,则蕞尔淡水不足平焉。”^②于是,在教导团两个团中挑选出的“奋勇队”105名队员,以敢死队的方式冒死冲锋。^③李秉中即在敢死队内:“是役也,为我初入战场,且为志愿加入奋勇队之冲锋者。”^④多数战友死伤,李秉中存活了下来。

棉湖之役则更为凶险,李秉中殊死得生。据其信中回忆称:“第二次之大战为棉湖之役,敌军为大名鼎鼎之林虎部队,万余人。我军仅一团人,形势岌岌,几致覆灭者屡,幸将士勇敢,卒能慑敌,两日苦战,转败为胜。其初,敌以大队自左侧围我,本连——学兵连——以五十余人应之,肉薄登阵,裂口大呼,敌遂却。异日收队,余廿余人耳。——本连自黄埔出发,共百廿余人,现伤病共计得五十余。呜呼,惨矣!——是役我陷敌中,跃水得脱,几溺毙。”^⑤战况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李秉中与鲁迅的书信也大多在此役中丢失。

经过东征大小十余次战役,李秉中从军的勇猛精神无可置疑。无论是在淡水之役中参加奋勇队,还是在棉湖之役中以学兵连一员苦守鏖战,李秉中均践行了一名军校生无视生死、勇猛冲锋的黄埔精神。因表现良好,在淡水之役后他还获得金牌奖并大洋三十元。然而,从军之时,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能否再见亲友均不可知,这种生活逐步让李秉中感到厌恶:“东江刻将肃清,想当暂得休息,甚愿告假入京,重理旧业,非慑于死,实又厌苦此种生活矣。”^⑥

及至第三阶段,经历过战场杀伐的李秉中,对于“为何而战”这一问题产生了自我质询,这也延伸出主义与革命关系的思考。棉湖之役发生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此役事关紧要,一旦战败,黄埔军可能不复存在。蒋介石也曾对此役下过如此断语:“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悍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州革命策源地亦不可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⑦

在对战争问题进行思考时,李秉中所确定的是他对孙中山精神的心悦诚服。总理逝世后,李秉中在给鲁迅的书信中谈及:“中山先生逝世,令人叹息,功业未就,遽舍一生,辛苦□□,党徒以视列宁之踌躇满志以去者;幸,不幸,何相越耶?此我国人之不如俄人,非中山不如列宁也。”^⑧可以看到,李秉中与同时期的鲁迅,均对孙中山逝世后遗存的革命精神表示肯定。李秉中在战场的枪林弹雨中冒险冲锋,则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山精神。

然而,李秉中以鲁迅刀刃向内的方式自我解剖后发觉,虽然自己对中山先生心悦诚服,但是所谓牺牲更多是源于自身的欲望,即以自身现阶段对于生命的理解而选择献祭生命的方式,而非以主义的方式切分敌我。这一点个人体会在其东征战斗经历中逐步浮现:“往者我亦谈主义,说牺牲,然我乃为我的欲望而牺牲,非为主义而牺牲也,谈主义以飨我之欲望耳。即如骂陈炯明,乃因我将与彼之军队作战,不得不一骂之;其实,我何必骂他。”^⑨

青年战士李秉中的这一疑问,实际上揭示出两层革命逻辑的冲突。其一,在投笔从戎的身份转型中,文学思考者与战斗组织者隶属于不同的人生经验范畴。当文学者将自身作为唯一

①④⑤⑥⑧⑨ 李秉中:《李秉中致鲁迅信》,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54、55、55、55、56、57页。

② 《挑选奋勇队攻克淡水城令(1925年2月14日)》,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合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第1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③ 曾庆榴:《黄埔军校史(1924—1927)》,第198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22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可以抵达世界的“这一个”，尝试以共情的方式理解并感悟世界的运转现象，再以声发于心的方式，由内向外地向世界坦陈自己的思考，由此完成个人经验中的文学生成，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是文学者理解并抵达世界的主要思维方式。然而，战斗组织者基于现实力量规划比对，确认作战方案，那么个体则成为可被组织的一个点，进而被编织进更大的组织架构中，而在这之上，则有更高维度的统筹方式。当李秉中弃文从武时，他暂时将个体声音熄灭，进而将自己作为可被规划的“这一个”，在黄埔作战中表现优异；然而，当个体声音再次响起时，他则需要面对自己内部经验与外部经验的不同组织轨迹碰撞。当然，文武身份能有兼容的时刻，即二者共同聚力于同一个时代奋斗目标。由此可以理解，鲁迅支持李秉中南下，鲁迅关注孙中山革命。然而，在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具有极大时代交叠度的同时，仍会出现局部的排异现象，此处即表现为李秉中的自我质疑。

其二，李秉中对中山先生心悦诚服，但对孙中山逝世后，其党徒的做法稍感不适，这其实是李秉中对军中形势的敏锐预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失败经验基础上，认识到“以党建军”的重要性，于是筹建黄埔军校。然而，孙中山并未能有机会看到这一战略的最终形成。孙中山生前作为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人物，对国民党具有较高的统筹力和话语权，因此，以党建军的决策顺利推进。然而其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利益团体快速切分了原属于孙中山的国民党领导意志，因此“以党建军—以校建军”的设想就此中断，走上了与原先相悖的道路。^①李秉中对主义的怀疑，对高呼杀陈炯明的存疑，实质上也是对国民党内部尚未统合的分散军事利益团体的质疑。而这的确导致了国民党后期发展的紊乱，也使得孙中山先生最初设想的国共合作大业未能实现。

由于李秉中在北京时与鲁迅交往颇多，其初入伍时的革命认知带有鲜明的鲁迅印记。因此，李秉中作为携有鲁迅革命战斗意志的黄埔亲历者，其行伍体验也影响着鲁迅对“国民革命需建立党军”这一改进情形的及时评判。当李秉中的黄埔从军经验和个人疑惑以书信的方

式抵达鲁迅处，鲁迅不仅以李秉中为孔道，了解黄埔军作战之艰辛，同样也接纳了李秉中的个人体验和私人情绪。因此，鲁迅将带着“李秉中之问”继续走向国民革命。

三、生命主义壕堑论 与“绿林鲁迅”的内部迭代

当李秉中的行伍经验照亮“绿林鲁迅”的时代侧影时，远在北京的鲁迅对“绿林之气”又增设了内外之别。具体来说，鲁迅自身可以鼓起杀伐决断的勇气，但面对以黄埔李秉中和北京请愿青年为代表的年轻生命，鲁迅以后退一步的方式提出生命主义壕堑论，以求保存青年主力。这与李秉中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无疑构成了极具对比意味的张力生命观。

李秉中参军后，鲁迅与其保持书信联系。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得李庸倩自黄埔所寄照片”^②，这表明李秉中正在军中且人平安。然而当李秉中书信未到之时，鲁迅心系南方，不知学生在军中情况如何。在1925年1月至2月的书信中，李秉中表达从军之喜和求有趣之死法的观点时，鲁迅却时有忧虑之色。3月11日，在与许广平的第一次通信中，鲁迅回答对于社会的

① 此处引述曾庆榴对黄埔“党军”走向偏离的看法，笔者认为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基于国民革命以党领军理念，基于对“军以党化，党以军成”的认识，黄埔军校所造就的军队，被称为“党军”。这本来是一支以服从革命党（国民党）领导、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奋斗宗旨的革命军队，然而，由于国民党内当时并没有真正形成由革命党来管治军队的力量和行之有效的机制，未能真正实现“以党领军”，因此，在“党军”诞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以“党”的名义而实质上是从小集团或个人利益出发去控制和篡夺革命军队的人物。其代表就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军队“党化”的开始，也就是“党军”异化的开始。随后（1926—1927年），国民党内“党权”“政权”“军权”的较量（表现为“中山舰事件”“迁都事件”“迎汪”运动等）的结果，是“军权”战胜了“党权”，同时也战胜了“政权”，形成了蒋介石军事集团“以军制党”“以军制政”的局面。见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第167—168页，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

② 鲁迅：《日记十四[一九二五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548页。

战斗方法,并不主张挺身而出,而是推崇欧战时的“壕堑战”,其缘由有二:一是“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①;二是“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②。

鲁迅希望能够更多地保存青年的生命,而李秉中既入黄埔,在军事行动中生死未卜便是常态。不仅如此,从鲁迅致许广平的回信中可知,李秉中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只是生命无常,更有军队内部分化严重,需要择队而站的问题:“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③

此时,鲁迅也瞠目于青年所做选择和所面临局势的复杂性,无论是将生命抛掷于短兵相接的练武场,还是在军中势力的角逐中求生,这已然超出鲁迅的文学思维批判和个人经验可供参考的范畴。换言之,革命形势发展之迅疾,将每个个体都卷入其中,即便是鲁迅的批判性思维也无法给出超前而稳妥的答案,鲁迅与青年同时面对陌生的未来。当青年勇敢者奔赴前线时,鲁迅以壕堑战的思维希望保存生命,拉长作战时限,这两种方式未有高下之分,只是作战方式不同。故而鲁迅只能关切着与自己为同行者的青年现况,及时提供帮助,却无法寄予其指导性意见。

基于此,鲁迅重新界定了导师与青年的引导关系限度。1925年3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力不从心:“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④5月,鲁迅在给吕蕴儒、向培良的信中也表示:“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⑤正是如此,鲁迅不想劝青年走自己的路,因为“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⑥。更为直白的是,鲁迅以《导师》一文切分导师与青年的经验链接关联,鼓励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⑦。

当鲁迅慎用以个人经验指导青年时,青年的蓬勃行动两次反哺了鲁迅,唤起了鲁迅直面战斗和叩问生死的昂扬状态,实现了鲁迅“绿林之气”的内外贯通,促进了“绿林鲁迅”的自我整合和内部迭代。

其一,李秉中的从军反馈助力鲁迅完成了“文坛战士”的壕堑战转型。李秉中在军中所寄每封书信均挂怀《语丝》,在第一次收到《语丝》第3、4、5期后,仍念念不忘前两期,并在信中请求“《语丝》想继续出版,望逐期赐我”^⑧。对于鲁迅而言,文艺刊物为前线战士所牵挂,能够成为征战者的精神慰藉,这无疑是一种鼓励和被需要的肯定。在《新生》流产时,鲁迅反思“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⑨。而在此时,鲁迅以《语丝》抵达李秉中处,这是鲁迅自嘲与黑暗捣乱时的正向反馈,也让其更加肯定坚守刊物阵地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鲁迅这一时期对北京刊物展开集中观察,并反思发现:“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⑩紧接着,鲁迅筹办《莽原》,其内容以思想及文艺之类为主,总基调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⑪。可见此时鲁迅办刊的两大特点,分别是强调文章“声发于心”、注重文章的当下性和现实及物性。

①④ 鲁迅:《25031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16、15页。

② 鲁迅:《25031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1页。

③⑩ 鲁迅:《25033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2、33页。

⑤⑥ 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4页。

⑦ 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9页。

⑧ 李秉中:《李秉中致鲁迅信》,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51页。

⑨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9-440页。

⑪ 鲁迅:《〈莽原〉出版预告》,《鲁迅全集》第八卷,第472页。

实际上,这是鲁迅与李秉中的两条生命观线路接轨后的文学调整。当李秉中的流血战斗与鲁迅的壕堑生命观形似对垒时,《语丝》架构出文艺批评与革命战斗之间的助力桥梁,也即当鲁迅想以保存生命的方式拉长战斗时效时,“文学者—报刊批评—行伍军人—前线作战”成为一条有效助益路线。同时,李秉中的战斗精神也影响了鲁迅对于报刊及撰文者的身份定位。即便未曾实际上前线战斗,文学解剖现实黑暗的战场上也需要勇猛战斗者,这也成为鲁迅定位《莽原》的重要考量依据,即鲁迅所表示:“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①于是,鲁迅寻找生力军,以此来创建彼时中国文坛最缺少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1926年,当鲁迅再次收到李秉中来信时,喜出望外之余,特将《莽原》三本寄送给李秉中。虽然鲁迅自称“一是翻译,两本是我的杂感集,但也无甚可观”^②,但仍将三本书寄至莫斯科(当时李秉中已受黄埔军校保送,前往莫斯科学习陆军),可见鲁迅很希望这些书籍能够给李秉中的军中生活以精神支柱,也想以文学战斗成果唤起同路人的共鸣。

其二,李秉中和“三一八”惨案中青年的勇毅行为,让鲁迅看到了遍是死地中生的光影,唤起鲁迅再次以文战斗的意志。鲁迅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为落款写成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详述了惨案经过:“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④鲁迅对此悲愤异常,一方面以“苟活到现在的我”的身份记念“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刘和珍君,^⑤另一方面对段祺瑞执政府大加鞭挞。在受异族侵略和鹰犬蹂躏的中国处境中,杀人原是存在于敌我之间,而此次却是段政府杀害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这使得鲁迅惊呼:“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⑥这种内部枪弹相向的情形,带来极为颠覆的危险信号:“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⑦

面对如此深痛的代价,鲁迅以痛心疾首的口吻劝导青年停止请愿,再次强调壕堑战及更换作战方式——“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⑧。就此次惨案来看,47条生命只获得陈源之流的帮凶言论,鲁迅痛惜生命以如此不值的方式牺牲,结果“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⑨。

当鲁迅对青年发出保存生命、停止请愿的恳切呼唤时,他心中牵挂着杳无音信的李秉中,战场刀枪无眼,更不知其情况如何。因此,在鲁迅收到李秉中寄来的书信时,难掩喜极而泣之态,以家人的口吻喋喋絮念对其生死未卜的担忧:“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⑩李秉中的来信给饱受青年喋血之痛的鲁迅以心理慰藉。

不仅如此,无论是战场上的李秉中,还是请愿赴死的青年,他们以生命实践的勇气给了鲁迅走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⑪的精神支撑。在《一觉》中,鲁迅重启与青年的精神际会:“我开手编校那历来积压在我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给一个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⑫此时,鲁迅翻阅青年文稿,透过文字与不同青年作者的

① 鲁迅:《250428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4页。

②⑩ 鲁迅:《260617 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29、527页。

③④⑪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80、278、280页。

⑤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90页。

⑥⑦ 鲁迅:《“死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82页。

⑧⑨ 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98、297页。

⑫ 鲁迅:《一觉》,《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28页。

思想对话。这种对话者各有其思想的鲜活主体体验,构筑出一个个以思想为单位的鲜活青年模样。鲁迅正是以此方式纪念着逝去的青年,他们为国请愿的主观世界也是如此精彩纷呈,且无惧生死。鲁迅借由这些“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①的青年,感受到自己“是在人间活着”^②。此时,鲁迅的生命感知与“三一八”惨案中升腾起的青年精神图腾共生。

综上所述,从李秉中投身黄埔军校的信件回馈来看,鲁迅受到其三重影响:其一,经过“三一八”惨案的冲击,鲁迅更加坚信青年需以壕堑战的方式保存生命,以期久久为功。其二,李秉中训练中不忘《语丝》,这不仅鼓舞着鲁迅重视报刊阵地,为从戎学生提供精神动力,也振奋着鲁迅在文学阵地创办《莽原》,寻找生力军,以此与现实黑暗继续战斗。其三,在鲁迅经历从青年无需导师论,到青年给予导师希望说的过程中,“绿林鲁迅”从存续于鲁迅精神内部的个人英雄主义状态,逐步向外敞开,完成了与勇猛青年精神共生的内外同一性整合,由此也形成了“绿林鲁迅”从斯巴达时期到“三一八”惨案后的自我迭代。

结 语 文学 / 革命越界可能与“同路人”可能性预演

随着国民革命时代浪潮的重启,当聚集着鲜明鲁迅印记的青年李秉中南下投军时,诸多要素随即展开流动。从时空场域来看,南北间的信息流动填补着鲁迅对国民革命现场的认知拼图,牵引着鲁迅对辛亥革命至当下革命的判断进行不断调适;从个体互动来看,李秉中书信揭示出“绿林鲁迅”的精神面向,并在鲁迅精神内部实现了从个体英雄主义张扬、群体生命观优先,到直面生死战斗的“绿林之气”的迭代更新。

除此之外,李秉中投笔从戎的身份转型和人生选择,带给鲁迅一种领域越界的额外体验,即文学者进入革命军序列这一行为发生后,在文学和革命这套既有的身份标识区分系统背后,存在多少种可能性的发展路径。实际上,这才是李秉中之于鲁迅超越现实具象层面的深刻影响之所在。

以“李秉中—鲁迅”的南北联络史实来看,无论是鲁迅之于李秉中的生活底色和战斗精神影响,还是经由李秉中召唤出的隐而未现的“绿林鲁迅”形象,都表明无论是文学者还是革命军,作为不同领域参与到时代浪潮中的战斗者,本就具备一种反叛既有的豪侠之气,这可谓一种时代气质上的同一性。

以“黄埔李秉中—文学者鲁迅”的跨领域关联来看,李秉中与鲁迅之间的关联,实际上提前预演了文学者与革命者如何同行的时代命题。显而易见的是,虽然鲁迅并未成为革命军中的一员,但是二者之间仍能互为依仗、补益前行。李秉中的革命勇猛可以激发鲁迅自觉成为文坛战士的主体定位,鲁迅的《语丝》文学实践可以激励李秉中的军旅之行。

以“文学青年李秉中—黄埔李秉中”的自我身份转型来看,李秉中的转型体会和自我质询实际上也是鲁迅身份能否转型的一次青年样本预演。从文学求索到枯燥训练,从主体欲望到革命主义杀伐,后者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改写了个体认识表达的途径。如何面对这两套逻辑所引发的内心冲突,鲁迅在1925至1926年期间并未对其正面回答。然而,“李秉中之问”实际上也在鲁迅心中根植下这份疑惑,为其留下后续关于革命策源地的观察点,这也成为鲁迅进入广州前的前文本。

概而言之,黄埔李秉中之于鲁迅的意义,不仅是极为珍视的青年挚友,也在激发“绿林鲁迅”革命面向、展开“同路人”方案可能性上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样本。这就使得鲁迅在进入“革命同路人”思考时,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源于苏俄的外来词汇,而是有着真切体验的肉身投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中的青年道路叙事流变研究”(24AZ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薛晨鸣,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鲁迅研究。

①② 鲁迅:《一觉》,《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28、229页。